

黃馥玲

個人簡介

1930 年生於香港。1938 年，回廣州探親，留居內地。1941 年，以軍人子弟身份入讀兒教院第七院。畢業後，升讀江村師範，後轉讀廣州植楨中學。曾在國內工農職業子弟學校任教，1981 年退休。1985 年，移居香港。

童年生活

我是客家人，1930 年 6 月 2 日在香港廣華醫院出生。父親在石塘咀做莊口生意，¹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做貿易。我有兩個媽媽，細媽是我的生母，她和父親住在香港；大媽住在廣州，家裡共有十二兄弟姊妹。父親經常都上廣州做貿易，每次都帶我同去，到了廣州就把我留給大媽。小時候，我多跟著大媽生活，非常快樂，不僅不用挨餓，還有長工和女傭伺候。1938 年，我回廣州探親時，剛好廣州淪陷，回不去香港，所以我們全家就走難，非常淒涼！那時想要一碗白米，以「戒指」跟人家交換，²但人家也不一定肯換。後來我們去了韶關，大概 1941 年，我入住兒教院。我在香港時年紀還小，沒有上學，到了兒教院才開始讀書。

七院生活

因為大哥在十二集團軍的經理處當會計，³所以我以軍人子弟身份入兒教院。當時哥哥認為不讀書是不行的，因此送我去兒教院。那時兒教院不會隨便接收流離失所的難民，只收有關係的孩子。那時搶救隊拯救回來的兒童，也要經各縣各鄉的公所介紹，再經家長同意，才可入住兒教院。不過，當時的孩子，只要到鄉公所報名，就可獲推薦跟隨搶救隊去兒教院了。

¹ 莊口為廣東俗語，指貿易生意。

² 戒指為廣東為語，即指環。

³ 抗戰時期十二集團軍屬第四戰區，長官為余漢謀。

我入兒教院時大約十歲，那時院主任是何巧生，而徐蕙儀是我讀二年班時接管七院的。初到時，何巧生叫我去教務處，要考試編班。因為我沒讀過書，只會寫「黃馥玲」三字。不過我在家裡曾學過計算，所以懂得加減乘除等運算。結果我不須讀一年班，直接升讀二年班。記得當時老師對我們說，要努力讀書，將來要報國保家。因為我是城市子女，思想特別開放，所以進去兒教院後，大概在 1942 年，就當了班長。

七院一區共有四個班，都是四年班。學校實行四年一貫制，學生讀完四年就畢業。二區有二年班和三年班，我住在二區，讀二年班，即最小的班級。每個教導區有二百人，分成四個班、八個組，每位導師照顧 25 個學生。我們須按所屬的教導區去活動，包括早上洗臉和上學。

早上，吹號一響，大家便起床穿衣，帶著手巾去河邊洗臉，洗完臉便去菜地澆水，之後聽院主任訓話。我們還會唱國歌，唱完就去上課，每節課四十五分鐘。午飯後便睡覺，然後上課。上完課，便去澆水，接著是自由時間，功課就是在自由活動時間完成的。晚飯後，我們去河邊洗澡，洗完再回營舍晚點。週末時，我會回家，因為家就在城裡，但很多人都無法回家，或無家可歸。

每逢週一，大家集體到蓮塘力行中學參加聯合紀念週。活動由吳菊芳院長帶領，每週有上千同學參加，有來自七院的、力中的和江師等院的同學。由沙園去蓮塘，要走八里路，所以我們很早便起床，走四十分鐘路才到。參加聯合紀念週，要穿整齊的童軍服，繫一條藍色領帶。紀念週會上，院長和司儀會站在台上，我們站在台下，先唸《國父遺囑》，然後聽院長訓話。吳菊芳院長通常叫我們努力讀書，諸如此類的。院長走後，我們就列隊回學校。

週六、日不用上課。有一次，我去南華寺旅行。⁴本來那次沒有低年班同學參加，但老師說可以選十個人去，而我剛好獲選上。那是我第一次旅行，走了很長的路，但很開心。當時我覺得南華寺好漂亮！除了旅行，學校也曾在操場舉辦營火會。我們會燒一個火篝，同學們圍著火篝玩遊戲。

那時經常有轟炸，每逢遇上轟炸，就會不斷廣播——「敵機、大坑口……」我們聽到廣播，就跑去樹林。我們在那裡溫習，老師有時也會講課，看情況而定。記得同學都不怎樣怕。1943年，我們在曲江中山公園舉辦展覽，展出我們種植的農產品，怎知遇上飛機轟炸，幸好沒有同學受傷，不過我們住的地方黃田壩，卻被燒毀了。

在學習方面，我表現很好，老師選了我做班長。我讀了半年，便轉去讀三年班。三年班相當於外面的五年班。課程方面，二年班有政治、文化、經濟、軍事四科。政治就是講一般的常識，經濟就是學數學，文化就是學語文，軍事就是進行軍操和童子軍訓練。這四科我讀得很好，年年升班。我是兒教院最後一批學生，趕上尾班車。我覺得在兒教院的幾年，學到很多東西，兒教院的教育質素很高，導師全是精英。我們有一本教科書，由崔載陽設計。數學科和政治科的內容，以問答形式為主；語文科則有課文。

剛到兒教院時，不大適應那裡的生活。後來高年班的姐姐教我讀書和規矩。但我覺得最難適應的是艱辛的生活，如沒有東西吃。兒教院的廁所離我們很遠，每次我上廁所，都很害怕，需要同學陪伴，後來才漸漸習慣。此外，我不懂計算。人家計分數，我卻不懂，幸好有同學幫我。那時候，陳紹駒坐在我後面，⁵我們是幾十年的老同學了，現在也經常聚會。

此外，我們還要自己種菜。七院的蘿蔔很好。我們二區的農場就在對面海，有船送

⁴ 南華寺為廣東六大名寺之一，位於廣東省韶關市曲江區馬壩鎮。

⁵ 陳紹駒先生為廣東兒童教養院第七院及力行中學校友。

我們過去，過去後就走到山頂種菜。當時由老師帶我們去，多在早上。起床後，我們便到河邊洗臉，然後拿水桶去菜園澆水，再回去上課。那裡的地是大家的，每人分得一塊，種什麼就由老師決定。那時候我們還會自己蓋房子，老師陪我們去砍竹和割禾草，但我沒有蓋過，蓋房子多由男同學負責，女同學則負責種菜。當時有這樣一首歌：「自己種菜自己吃，自己煮飯自己吃。」我們自己建造營房，想來也真厲害！

我們會唱《新生兒童大合唱》，它由何巴栖作詞，黃友棣作曲。我記得那時還有幾個歌王跟著黃友棣到七院教我們唱歌，其中有莫天真、毛秀娟和雷德賢。歌王帶我們唱歌，教我們用氣。那時我是歌詠隊的總指揮，四個合唱隊皆由我指揮。當初是老師推薦我去試一試指揮，結果學校在眾人之中挑選了我。其實打拍子要看拍子的強、弱、次強、次強，如果是兩拍子，就是強、弱、強、弱。我們的院歌就是兩拍子的。二年班時，我加入了歌詠隊，由徐蕙儀的弟弟徐冠緯教我們唱歌。⁶徐冠緯是中山大學學生，暑假時會來兒教院教我們打拍子。當時我們還有自己的風琴。除了唱《新生兒童大合唱》，還唱黃友棣寫的其他歌曲，如《良口烽煙曲》。歌詠隊有兩百多位同學，來自各區，分成高、中、低音。下午自由活動時，我們便拿著歌書去學校本部唱歌，老師安排練習，我們就去練習。我們曾經去韶關互勵社表演，和平後也曾參加比賽，拿過亞軍和季軍。我還參加過獨唱比賽，當時唱《夜鶯曲》，贏了冠軍。後來在廣州，歌詠隊又去南方劇社演出。雖然同學間平時講廣東話，但唱的多是國語歌。

睡覺時，男生和女生是分隔開的。當時同學年紀差別不大，分隔開來也較易管理。我們睡的營房，位於墟市的通道，和高年班同學的床相通，年紀稍大的同學有時還會扮豬頭來嚇我們。我們被嚇後，便哭出來，不過他們又會走過來哄你，十分好玩。

七院還有兒童郵局和兒童銀行。那時候，如果家人寄錢來，會暫存在銀行裡，不怕

⁶ 徐蕙儀當時擔任廣東兒童教養院第七院院主任。見《烽火歲月的豐碑：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》，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編，1995年，頁163。

被偷。銀行由老師選出來的同學管理，錢則放在一個箱子裡，由導師看管。因為我家在曲江，週末可以回家，所以不需要錢，也沒有錢存在銀行。我有時從家回來，會帶點臘腸和花生，分給大家吃。當時我的情況算是不錯的，起碼還有家庭。

七院的醫務所有三間病房，軍醫姓王，還有一個姑娘。如果同學發燒，就到那裡看病。我曾經患肺炎，到醫務所留醫。因為患的是傳染病，醫生要我留院。當時不是生病就能留醫的，比如發冷只給藥吃，自己要在宿舍休息。聽說那時候院主任何巧生壓力很大，每晚都會巡看醫務所，如果醫務所亮著燈，她就擔心；如果醫務所沒有亮燈，她就可以安心睡覺。

在七院的時候，我很活躍，既做指揮，又做班長和中隊長。現在跟我一起打麻將的老同學愛說笑，說我當時是七院的校花。我想因為那時我穿短褲，站在臺上，他們認為我的腿長得好看，所以說我是校花。那時候我覺得自己還不錯，比較自以為是，但其實有些同學也很厲害，只是老師沒有找他們而已。由於我有自信，也有膽量，所以就做了學生領袖。也許我是城市姑娘，膽子大，什麼也不怕，不過我不會罵人。有的同學吵架時說話粗俗，我非常不習慣。

據我所知，兒教院的經費主要靠院長籌募而來，中央只撥了一點。七院的經費便是由院長籌措回來的，至於連縣幾個院的經費，應該由中央支持。後來我看了校友通訊，才知道當時兒教院好像還有地下黨員。

大撤退

七院畢業時，日軍快要到曲江。後來兒教院決定師生大撤退，七院有千多人，分成幾隊，每隊二百人。我們從韶關出發，經過風灣、仁化到雞公山，再走到和平。那時我們背著包袱，老師教我們把包袱打成一個結，裡面有衣服、牙刷、手巾、口杯、水壺等。我們離開時穿草鞋，若草鞋破了，就沒有鞋子穿，結果下雪天也要赤足走路。當時應該

有人打前站，因為沿途都有人煮飯，有東西吃。如果生病，就沒辦法了，當時有同學真的病倒不治。撤退的過程很艱苦，沿途有人看到我們的慘況，會給一點東西我們吃。我們的隊伍很長，有兩百多人，一個老師實在難以照顧，所以途中有男生被捉去做別人的「仔」，⁷也有女同學被人侵犯。那時候老師帶著我們逃難，真的很偉大！

江村師範

七院畢業後，我升讀江村師範。當時崔載陽是江師的校長，他待人和氣，廣東話也說得比吳媽媽（即吳院長）好。那時他要七院選十個同學去面試，我獲選上，並以最高分數考入江村師範學校。力行中學和江村師範學校都是不收學費的，但我考不上力行中學，而江師錄取了我，⁸於是我便去江師念書。還有些同學升讀北江農工職業學校，後來有很多人當了工程師，非常厲害！那時已是抗戰後期，我們從東莞經河源、石塘路去師範學校，學校大概就在龍川附近。

但我在江師的時間很短，上過一些課，但已記不清楚具體內容。崔載陽校長離開後，戚煥堯繼任。江師的同學年紀比較大，有十幾歲的。我們不須穿校服，也不須穿童軍衫。江師的前身是教會，在廣州大鐘樓附近，它後來改名為北江師範。我在那裡只讀了半年左右，還沒畢業，便轉校了。

說起來，因為在七院畢業時，日軍快到曲江，我們還來不及拿畢業證書，就要躲避日本仔。後來在香港，徐蕙儀給我寫了一張證明書，證明我完成七院的學業，並在江師肄業。

戰後日子

和平後，我回到廣州，找到家人。大哥說：「別去讀了，去郊區讀書要坐車，就在

⁷ 仔為廣東俗語，即兒子。

⁸ 江師即廣東省立江村師範學校。

市區讀吧。」於是，他幫我找了植楨中學。哥哥是國民黨人，所以我讀書不用交學費。我認為在植楨中學讀書獲益不多，浪費時間，反而在兒教院讀書時還有進益。兒教院的老師全是師範學校畢業生，全是精英，比植楨中學的厲害多了。所以，我就停學，在廣東的工農職業子弟學校當老師，教四年班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政府封閉，我回不了香港，一直在大陸當老師。後來經歷了三反、五反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，我明白家庭出身和成分決定政治命運。無論如何，一家人總要吃飯，因此我仍然努力工作。

晚年生活

1981年，我在大陸退休。退休後，找了幾個兒教院的同學組織同學會。最早一批全是當年的老師，後來才是同學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老師和同學參與最多，那時候很多人還沒有退休。1984年，我來香港探親一個月，兼辦出世紙。1985年，申請到香港定居。我組織了每月茶聚，一直都參加，到最近走不動了，才沒有去。陳紹駒籌辦了正式的校友會，每年都有一次聚會。大家喝茶相聚，也一起去旅遊。

2003年，我從美國回香港，不幸細菌入侵肺部，在醫院隔離了接近一個月。現時我仍須使用氧氣機維持呼吸暢順，但我沒有自怨自艾。我覺得環境際遇人人不同，生存時若想自己過得好，就要想想辦法，其他人是幫不了你的。我鼓勵自己要想辦法，不為環境所限。

2007年我領洗，成為天主教徒。我現在會跟教會姊妹談天，或閒時相約朋友一起打麻雀，多動腦筋。生活上，我不會浪費，也絕不會待薄自己，會吃有營養的食物，不令子女擔心。



黃馥玲 (2014)